

王建军 著

汉语存在句 的 历时研究

天津古籍出版社

HANYU
CUNZAIJU
DE
LISHI
YANJIU



H1146.3
62

汉语存在句的历时研究

王建军/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存在句的历时研究/王建军著.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3. 1

ISBN 7-80504-969-6

I. 汉... II. 王... III. 汉语—句法—研究
IV. H14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1020 号

汉语存在句的历时研究

王建军/著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 300020)

天津市腾龙印业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25 字数 250000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7-80504-969-6

定 价: 18.00 元

序

古今汉语研究之间的衔接与沟通目前正成为汉语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亮点。从历史着手研究汉语的现状,从现状出发探讨汉语的历史,这既是汉语研究走向深入的必然要求,也是汉语研究取得实绩的必经之途。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致力于相关的研究并因此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我们欣喜地看到:古今汉语研究之间的界限正被打破,理论的渗透、方法的借鉴、材料的共享已蔚然成风,这股清新之风无疑将对汉语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

建军同志的《汉语存在句的历时研究》一书正是这一学术新风引导下的产物。本书是作者在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所写的论文。建军同志曾经于1986—1989年期间跟我学习,当时主要研究现代汉语语法。在做了几年工作后,又到南京大学接受柳士镇教授的指导,开始涉足汉语语法史研究领域。看了这本书后,大家也许会对建军同志的这两段求学经历有所察觉,因为现代理念与历史材料的融汇恰是本书呈现出的一大特色。尽管这种融汇可能不尽圆满,但作者沟通古今汉语研究的意图是十分明确的,倾注于其中的努力也是显而易见的。书中对存在句时空背景、主题性特征、结构类型、动词配价等问题的研讨都时时让我们感受到这一点。

存在句是古今汉语通用的一个基本句类,产生时间早,使用频

率高,历史跨度大,发展的阶段性也极为分明,以往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现代共时层面,相关的历时研究比较薄弱。《汉语存在句的历时研究》作为一部有关存在句通史研究的专著,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通史研究离不开断代研究的支撑,否则就会失之于空。作者采用了点线贯通的研究方法,即通过一系列观察点的设定来串联起各类存在句发展的主线。这里所谓的观察点其实就是汉语史的各个重要时期的代表性文献。具体做法是,先对所选定的代表性文献中的存在句进行穷尽的统计,然后再作历史的比较,显示异同,这样勾勒出的线索往往就比较客观、清晰。作者在材料的把握上是审慎的,这是通史研究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掌握丰富的材料不仅是学术研究走向踏实的保障,也是学术研究获取新发现的源泉。像主谓谓语句存在句以前就一直为人所不察,作者通过对众多用例的比勘与核查,不仅证成了其现实存在,更考索出其历史渊源,从而补足了汉语存在句的句类系统。另外,书中对无中介动词存在句的考察、对“便是”语法化进程的追踪也都是立足于材料、得益于材料。由此可见,材料是汉语史研究的基石,拥有丰富的第一手材料是任何研究者都首当掌握的一环。

当然,有了材料还要能很好地加以利用。对汉语史研究来说,利用材料来充分描写现象、合理解释原因就不是一件易事,这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充分描写是合理解释的前提,合理解释是充分描写的升华,而两者的结合则是汉语史研究所追求的一种至高境界。不满足于现象的描写,力图对现象作出恰当的解释,这也是本书留给读者的一个印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余论”部分虽说篇幅不长,但其中对存在句发展成因的揭示却耐人寻味,如将时空观、主题化、汉语句法的扩充律归结为存在句发展的外部制约因素,将句式类推、词汇替换、语法化归结为存在句发展的内部生成机制。

不可否认,受学识及视域的限制,此书在历时描写方面总体上

还是粗线条的,有些地方还可做进一步的深化与细化研究。这些都需要作者去挖掘更多的材料,去做更深的思考。建军同志正值年富力强,相信经过一番努力,今后会有更丰硕的成果问世。是所望焉。

廖序东

2002年8月5日

目 录

第一章 绪言	1
一、本课题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1
二、汉语存在句研究概况	3
三、本课题的研究范围、语料来源和研究方法	20
第二章 汉语存在句的内涵、类别、模式和分布	25
一、汉语存在句的内涵.....	25
二、汉语存在句的类别.....	29
三、汉语存在句的句法模式.....	37
四、汉语存在句的分布类型.....	51
第三章 时空观与汉语存在句	59
一、时空的内涵和性质.....	59
二、汉民族时空观的产生与发展.....	61
三、汉语的时空表达系统.....	68
四、时空在汉语存在句中的表现形态.....	77
第四章 主题化与汉语存在句	89
一、主语与主题之辨.....	89
二、汉语存在句的主题性.....	94
三、汉语存在句的主题化过程	105
四、余论	116
第五章 动词配价与汉语存在句	120

一、存在句中介动词“价”的确认	120
二、存在句中介动词的句法框架和语义框架	124
三、存在句中介动词的价化历程	130
四、存在句中介动词的基本类别	136
第六章 叙述型存在句的历史发展	140
一、“有”字存在句的历史发展	140
二、“无”字存在句的历史发展	170
三、“没”字存在句的历史发展	180
四、余论	187
第七章 描写型存在句的历史发展	191
一、行为动词中介存在句的历史发展	192
二、主谓谓语句存在句的历史发展	228
第八章 判断型存在句的历史发展	244
一、“是”字存在句的历史发展	245
二、无中介动词存在句的历史发展	271
第九章 余论	285
一、汉语存在句发展的总体趋势	285
二、汉语存在句发展的外部因素	290
三、汉语存在句发展的内部机制	293
四、汉语存在句的类型特征及其成因	297
五、汉语存在句的历时研究与汉语史的分期	301
六、汉语存在句的历时研究与文献考证	304
主要引用书目	309
后记	313

第一章 绪 言

一、本课题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存在句是汉语中一类特殊而重要的句子。其特殊性与重要性约略见之于以下三点。

一是产生时间早,历史跨度大。人类思维史的研究表明,“存在”的观念是人类最早必须具备的基本观念之一。可以想见,作为存在表达方式的存在句也应是人类语言中的一种先驱形式。就汉语而言,在存世最早的文献——甲骨文中,存在句已露端倪,雏形粗成。至《诗经》、《尚书》以及金文里,形式和意义完备的存在句不仅正式告就,而且应用上也趋于寻常。存在句与汉语的历史相伴随,走过了一条绵延不绝的发展之路。与汉语研究中一向备受关注的判断句、被动句以及处置式相比,存在句的历史恐怕要更为悠久。

二是覆盖面广,使用频率高。“存在”是一切事物的运动方式和表现形态,势必要占据人类交际活动的中心位置,成为人们无法回避的话题。存在句就是以表现事物的存在性为主体的语言形式,作为“存在”理念的最佳表达渠道,其通行与频用当在情理之中。事实上,尽管存在句不同的类型有不同的语用效果,应用上各有侧重,但在各种言语场合均不可或缺。就书面文献而言,韵文、散文中都有大量的分布。存在句在文学作品的情景描写、人物描写方面占据着中心句的地位,往往构成篇章的主体。由此可见,存

在句的语用价值丝毫不逊于判断句、被动句等,同样是汉语表达系统中的一个基本句类。

三是句法、语义和语用类型不拘一格,发展的阶段性极为分明。存在句自诞生至今,不仅语义上有时间句、空间句与时空混合句之分,而且句法方面也不断演进,先由无中介动词句过渡到非行为动词中介句,再由非行为动词中介句演进到行为动词中介句。其语用功能也经历了由单一叙述型向“叙述+判断”型和“叙述+描写”型的转化。凡此种种都一再表明:存在句是一个历史范畴,我们完全可以在汉语史的总体发展框架下对之进行必要的描写与解释。

就以上三点所论而言,给予存在句多大的研究力度似都不为过。但令人遗憾的是,和炙手可热的判断句、被动句及处置式研究相比,存在句的研究始终略显冷清,起步晚,进展慢,至今尚有很大的拓展空间,特别是相关的历时研究。直至20世纪末,储泽祥等人的一篇《汉语存在句的历时性考察》始宣布了历时研究的正式启动。可以说,存在句的历时研究至今还是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历时研究的匮乏不仅使存在句的自身演进史一直湮没无闻,同时也极大地牵制了共时研究。共时研究中许多至今仍争执不下的问题,如存在句的定性问题、划界问题、分类问题等,都与历时研究脱不开干系。

开展存在句的历时研究除了对存在句本体研究的推动作用外,其相关的成果还可为汉语史的断代工作、古典文献的考证工作提供重要的借鉴或有力的参考。这种延伸式的应用研究应当在存在句的总体研究中占据一席之地。

历时研究离不开对共时研究的把握,也不能摆脱共时研究的指导。因此,在开展本课题研究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一下前人所走过的共时研究之路。尽管历时研究正在起步,但其中的任何一点细微进展都足以给人惊喜,因此已取得的历时研究成果理所

当然地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这样做既是出于传承学术薪火的初衷,也是为了避免让自身堕入虚妄的泥淖。

二、汉语存在句研究概况

自汉语语法学的开山之作《马氏文通》问世至今,汉语语法研究已经历了百年沧桑。在这漫漫的百年之中,与其他各种语法问题一样,存在句的研究也经历了从无到有、由浅而深的过程。这一过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 朦胧意识阶段(《马氏文通》问世——建国前)

在这一阶段,整个汉语语法研究尚处于摸索与草创状态。当时的学者一心专务汉语语法体系的创建与汉语语法研究模式的探讨,对一些个案问题尚无暇顾及。因此,存在句在当时尚未引人注目,更未成为一种独立的研究对象,只在学者探讨其他语法问题时被顺带触及。例如,《马氏文通》在讨论“同动助动”时,对“有”、“无”的用法详加阐释,其中也涉及到了“有”、“无”用以表存在的情形。如对“今有璞玉於此”以及“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之类的句子,马氏就一再声称“凡记人物之有无,惟有止词而无起词”^[1]。在马氏看来,句中的时间词与空间词只是一种“加语”,整个句子属于“无起词句”,即所谓的“无主句”。马氏的这一观点对后世影响至深,余绪不绝。如陈承泽在其《国文法草创》里就持有相同的观点:“‘有’‘无’二字为无主动字,其所著之语,不可释为主语之倒置。”^[2]连五十年后诞生的“暂拟体系”也未能幸免。“暂拟体系”列举了四种“无主句”,存在句(“体系”中称为存现句)赫然在目,其句法特征被归结为:“处所词或时间词一律是状语”,“这类句子……只有谓语部分,没有主语部分”^[3]。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张静先生仍坚持认为:“表示主语有什么、在何处,或者只是叙述出现了什么、消失了什么的无主句都叫存现句。”^[4]张氏还为之作了

解释：“从语法意义上说，这些句子不是着重说明前面的方位名词怎么样，而是着重什么存在、出现或消失了什么；方位名词跟后面的动词没有表述与被表述的主谓关系，只有修饰与被修饰的偏正关系。”^[5]

黎锦熙先生在《新著国语文法》中首次启用“存在”一说，他在论述“有”字的特别用法时列举了以下两个众所公认的存在句用例：东面有一道松树林子/茶棚里有许多的工人，并指出：“其实这动词‘有’字，并不是表‘所有’、‘领有’的意义，乃是表‘存在’的意义。”^[6]黎氏特别强调：“有”表存在的意义是“有”字的“特别用法”^[7]。将“存在”从“领有”中剥离出，体现出黎氏洞幽察微的过人之处。后来的陆俭明先生等人在分析“有”的语义特征时也都提到了[+存在]、[+领有]这两点。我们今天在对“有”字句、“无”字句的存在用法与非存在用法进行甄别时依据的就正是这两点。值得注意的是，在原书的附注中，黎先生还对“有”的上述用法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有’字这种用法，专表‘存在’意味的，就可以属之于内动词。”不仅如此，黎先生还针对句首的副位（副位类似状语——引者按）名词，将此类“有”字句分为时间与空间两大类，以下即为黎先生所举的两类用例^[8]：

深山有老猿；大海有鲸鱼……（空间的）

这薛家集上有百十来人家……

元朝末年有一个崑奇磊落的人。（时间的）

昨天有一桩奇怪的事情……

尽管黎氏未给此类句冠以“存在句”之名，但类似的意思已十分明了。另外，从黎著将“东面”、“茶棚里”视为“似主位（主位类似主语——引者按）的副位”^[9]这一点来看，黎氏对“有”字句中时空词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已有所认识，只是处理上还略为保守。

稍后出版的《中国现代语法》则注意到了“是”字存在句的一些与众不同之处。比如，对“一身是胆”、“满身是汗”这类句子，王力

先生就视为“不合逻辑的判断句”，并解释说：“用判断句表示人物的处所时，似乎是一种倒装法，主语在系词的后面。”^[10] 尽管言之欠妥，但显然对此类句子的特性也有所察觉。对这类“是”字句的形成原因，王氏还从语用方面作了说明：“这种情形，是由于语言的经济所致。”^[11]

真正提出“存在句”概念并给予较为明确界说的是吕叔湘先生的《中国文法要略》。吕氏将“有无句”分为两类：有起词的和没有起词的。在论及“岂有此理”、“有人于此”等“无起词的有无句”（书中归为甲类）时，吕氏说：“这一类有无句单纯表示事物的存在，也可以称为‘存在句’。”^[12] 另外，“玫瑰花有红的，有白的”这类“分母性起词的有无句”（书中归为丙类）也被吕氏视为存在句。吕氏重申：“真正只表示‘存在’而不参加别的概念的，只有上面的（甲）类和（丙）类。”^[13] 除外，吕氏在论述“时地性起词的有无句”（书中归为乙类）时还举到了几个现今公认的存在句如“蜀之鄙有二僧/盖前世尝有不葬其亲者”^[14]，并指出其中的“蜀之鄙”与“前世”为“准起词”，吕氏认为：“（乙）类句除表示一人一物的存在外，兼表示此人此物与某时某地有关系，例如‘蜀之鄙有二僧’，表示两个和尚的存在，同时表示这两个和尚跟四川地方有关系。”^[15] 可见，吕氏所说的存在句只限于“有无句”，并且不管这些句子是否具有时空词语，这与学界后来关注的存在句颇异其趣。附带一点，在探讨与语序有关的“两种特殊的二成分句”时，吕氏还提及了两类与时空词语相关的句子：其一如“东隔壁店里午后走了一帮客”，其二如“每个船上点了一个小灯笼”，并认为句法上应属“一个典型”^[16]。为此，吕氏还专门解释道：“我们可以说这两类句子的动词后成分对于动词虽有起词（即施事——引者按）和止词（即受事——引者按）的分别，对于句子则同为主语，这就是我们的同一典型之感的由来。”^[17] 吕氏尽管没有将上述句子纳入其自称的“存在句”系列，但他这种不囿于施受关系的句法观念在当时堪称远见卓识，实在难

能可贵,无疑为以后对主宾语问题的探索提供了一条极有价值的思路。

总之,在此阶段,尽管学界对存在句的一些特性和特点不无感觉,但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专门的研讨更无从谈起。即便偶尔触及,也是浅尝辄止,由此导致认识上的一些误区。此期,人们对汉语的句法结构总体上认识模糊,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自身对存在句的感知和察觉。这一局面的形成与当时语法研究的大气候是直接关联的,对此我们不能苛责于前人。

(二)独立研究阶段(建国后——文革前)

这一阶段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语法讲话》。尽管全书未辟专门章节讨论存在句,但相关方面的内容足以视同专论。例如在分析“地位词”(后改称“处所词”)的语法特点时,文中在明确指出“表示事物存在、出现、消失的句子常常拿地位词做主语,这是地位词的特点”之后,还分别列举了各类用例。其中对“存在”类诸例所作的解说尤为精辟透彻,不妨援引于后:

“表示存在的例如:

桌上有两张报纸。

桌上放着两张报纸。

里头有人,你不要进去。

里头坐着好些人,他们是开会吧。

靠墙的八仙桌上有几个茶杯,地上放着新洋铁壶,壶的四周爬着好几个香烟头儿,有一个还冒着烟。(老舍)

阵地上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只想:只要有我在,就有阵地在。(巴金)

‘桌上、里头’是主语,表示存在的处所。动词‘有’单纯表示存在,‘放着、坐着、爬着’表示存在的方式,‘剩下’也是一种存在,动词后头的宾语表示存在的是什么东西。”^[18]另外,《语法讲话》还对几种常见的存在句作了确认:“表示存在的句子,‘在’字、‘有’字、

‘是’字都可以用。”^[19]其间也涉及到了彼此的区别：“‘柜子里有书，柜子里是书’这两句句法一样，意思还是不同。‘柜子里是书’，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知道‘柜子里’有东西……‘是’字包含‘有’的意思，可是不仅仅是‘有’的意思。”^[20]可见，《语法讲话》虽对存在句未置专论，但对其内涵、类别和构成都有触及，可取之处甚多。其后的不少语法专著和教材在这一点上少有出其右者。

接下来值得一提的便是 50 年代中期的“主宾语问题大讨论”。在整个过程中，“台上坐着主席团”之类的存在句始终是讨论的热点和焦点之一。尽管相关讨论是围绕主宾语问题而发，实际上却关涉到存在句的成句资格以及如何看待等核心问题，所以这场讨论与其说是针对主宾语，不如说是在为后来的存在句研究作奠基或预备。据黄南松统计，《汉语的主语宾语问题》一书所收的 30 篇文章中，涉及存在句并对其语法分析表现出倾向性意见的论文就有 23 篇之多^[21]。在这场讨论中，对存在句有两派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派是词序派，主张按语序及语用特征承认存在句的正常性与合理性，例如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二年级汉语科学小组在强调“语序是汉语极其重要的特点”后指出：“‘台上坐着主席团’的‘台上’是说话人心目中想要说明的地方，所以是主语。”^[22]对此，邢公畹先生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当地位词（即处所词——引者按）用在体词谓语句和动词谓语句中做主语时，是说者表示他所发现的有关事物的存在、出现与消失的现象。这些地位词是表示现象所发生的地点，成为一句话引起陈述的成分。”^[23]另一派为意义派，倡导依据施受关系来确定句法地位，将存在句视为一种非正常的倒装现象，如岑麒祥先生就认为：“在‘台上坐着主席团’和‘隔壁店里走了一帮客’这些句子里，我们无论从语法形式还是从意义看，主语都是后边的‘主席团’和‘一帮客’而不是动词前面的‘台上’和‘隔壁店里’。”^[24]王力先生也坚持：“必须否定‘台上’和‘店里’的主语资格，因为‘坐’和‘走’的行为并不是属于‘台上’和‘店里’

的。”^[25]从根本上否认存在句的特性。由于两派在当时相持不下，所以包括存在句在内的很多问题都悬而未决，没有达成共识。对这次讨论中的症结，朱德熙先生后来有过精辟而透彻的分析：“五十年代主宾语问题讨论中曾经出现许多糊涂想法，其中一些就是由于没有把这些概念的性质弄清楚引起的。进行语法分析，一定要分清结构、语义和表达三个不同的平面。结构平面研究句子里各部分之间形式上的关系。语义平面研究这些部分意义上的联系。表达平面研究同一种语义关系的各种不同表达形式之间的区别。这三个方面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主语、宾语属于结构平面，施事、受事、与事、工具等等属于语义平面，话题、陈述属于表达平面。”^[26]虽说意义派与词序派在当时未决高下，但就后期影响而言，把存在句的结构分析为“主—动—宾”的意见似乎稍稍占据了上风。

继承“主宾语问题大讨论”的余绪，学界对存在句的研究有所发展，开始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以下两篇重要专论的问世堪为其标志：其一为《中国语文》1957年8月号上的陈庭珍文《汉语中处所词做主语的存在句》；其二为《中国语文》1963年第5期上的范方莲文《存在句》。

陈氏是汉语语法研究史上把存在句作为独立课题来研究的第一人，陈文是一篇颇有创见却又被学界有所忽视的杰作。文章开宗明义，在提出“处所词代表具体的空间概念，可以作为陈述描写的对象，可以做句子中的主语或宾语”的观点后，作者明确主张：“……处所词（词组）做主语的句子，应该分析为‘主—动—宾’。”文中专门对众说纷纭的“处所词做主语的存在句”的现象作了论证。作者重点从语用角度比较了“一本书在桌子上”和“桌子上有一本书”这两种格式，认为：“一种是以事物做主体，用动词‘在’……另外一种表现方法是以处所做主体，用动词‘有’。”并进而指出这两种格式中“说话的人对所叙述的那件客观事实的认识过程、叙述重

点是有区别的”。作者还扩大了“存在”的外延,主张将表示“出现”和“消失”的句子纳入存在句之列,其理由是:“‘出现’是‘存在’的开始,‘消失’是‘存在’的终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确认了“桌子上放着一本书”与“屋子里坐着一个人”在结构形式方面的共性,其立足点是:“这类句式是表现事物存在的句子,不是叙述行为动作的句子。动词后面的名词不是以行为的施动者或受动者的身份出现的,而是以存在的事物的身份出现的。‘桌子上放着一本书’与‘屋子里坐着一个人’这两种句子,动词和后置成分之间的关系,如果从动作行为和施事受事的角度来看,当然大不相同,但是如果从存在的姿态和存在的事物这一角度来看,就可以是同一格式。”这显然是对吕叔湘先生早期观点的一大阐发。另外,作者还注意到了存在句中动词带“着”时的状态,指出:“这类句子的动词一般可以不表示真正的动作而表示事物的静态,在这类句子中动词后面的词尾‘着’正是表示静态的标志……这个‘着’是表示状态的持续,并不是表示行为的进行。这是与一般叙述句中‘着’字的用法不相同的。从这里也可以说明这类句子的动词不是表示真正的行为动作的而是表示存在的姿态的。”这大概是有关存在句状态的最早表述。对句首处所词是介词结构的句子,如“在我们后面的观礼台上,站着许多外国来宾”,作者处理上较为矛盾,一方面承认其为“存在句的一个别类”,一方面又在句法上将之归为无主句。

范文应该说是代表了此阶段该项研究的最高成就。在文中,范氏没有拘泥于以往的主宾语之争,而是首先把研究的触角伸向存在句的语法特点,着重描写了“处所词+动词带‘着’+数量名组合”三部分的构成状况。范氏认为:“这种句子和一般动词谓语句不同,主要出现在描写的场合,不大出现在一般叙述中……过去的讨论只注意动词的前后成分,对动词本身注意不够。实际上,这种句子中的动词和一般动词谓语句中的动词相比,特点很不一样。”把带“着”的中介动词存在句依次解析为A(代表处所词语)、B(代